

日常生活的价值与尊严

曹文军《逆旅行人》读后

汪政

活。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也是一种做人的态度，更是一种文学的态度、散文的态度。

“人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阳光、自由和一点花的芬芳。即便这样的芬芳是素淡的、缓慢释放的，却恰如其分地揭示了现实、艺术以及人生的奥义。在那一刻，我们是如此坦率、诚恳，心生安宁与欢喜。”散文的生命在于真实，其最高境界是背后站着一个人。许多散文作者看不起日常生活，觉得它太琐屑、太平凡。然而，正是这些日常生活构成了我们的人生。人的生活伦理是要将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活出滋味，而文学的最高境界正在于将日常生活写好，写真实，写出其中蕴藏的意义。

读曹文军的文字，我们找不到宏大叙事，但能感受到他的真实。他认真地生活，四季轮回、花开花谢、亲人、同事以及那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都留在他的记忆中，走进他的笔下。一棵即将拆迁的楝树也能引发他无尽的思绪：“不管这棵楝树今后去向何方，今日相逢便是有缘。我再一次细细地嗅一下花香，那一簇簇小花也依依不舍地招手。一花一世界，一树一乡愁啊。”

我反复阅读了他关于健康、治病与医生的篇章，写得如此细腻。如果不是他的作品，我还真的不知道眼睛竟然有那么神奇奇怪的毛病，原来眨眼也有那么多的学问和高大的说法。曹文军就是这样一个人对生活的体贴入微的人。他体贴了、人微了，自然就能知道生活的滋味，明白生活的意义，转而化为文字，熟悉的生活竟然变得陌生起来，因为它被有心人重新审视过、发现过了。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明明是自己经历过的，却因为无心而习焉不察；而当它们被别人重新说来后，我们竟如初见，继而恍然大悟。这就是读了曹文军作品后的感觉，相信读者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人同此心，心同一理。

曹文军写的就是家常事，说的也是家常话。他在中秋夜对女儿的思念中写道：“我走到阳台上，举头窗外，天空中繁星点点。今天你一定会做一个好梦。你知道吗？那满天的星光都是关注的眼神，在注视着你。相信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本不想探究，但评论的习惯还是让我忍不住追问。如果不算是牵强附会的话，曹文军这种生活态度和文学价值观，大概与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泰州学派不无关系。

泰州学派主张道在日常，认为无论多么高深的道理，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体悟到。因此，不在乎你是否做学问，甚至是否识字，都能在生活中体会到天地的规律、人生的道理。所以，要想悟道，重要的不是焚膏继晷、皓首穷经，而是认认真真地生活，过好每一天，做好手边的每一桩事。我认为这是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真正的人生哲学不是倡导人好高骛远，而是扎扎实实地过好当下，给日常的日子以意义，让普通人过得有尊严。

泰州学派对明清以后中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扬泰地区的影响很大。而且因为这一学派的主张与传播方式，它已经渗入了这一地区的日常之中。生于斯、长于斯的曹文军，在潜移默化中应该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

道在日常。这是生活的哲学，也是文学的律令。正如曹文军所说：“其实，只要我们心中有道彩虹，它会激励着我们在迷茫时看到希望，在繁杂时懂得坚守，不负韶华，不负春光！”这便是我读了曹文军文集后最深的感受、最大的收获。借曹文军作品出版之际，我抢先一步说出来，与读者共享。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当我手捧曹文军即将出版的文集《逆旅行人》时，我迫不及待地翻阅，寻找其中是否涉及迫身为税务官的相关内容。果然，书中《那一束光》一文，记录了他从物质匮乏的少年时代，如何一步步克服困难，走向税务人生的历程。这足以证明，曹文军对工作的热爱。我常看到一些作者，在文章中抱怨自己的工作，他们似乎认为文学是高雅的，不应谈及工作，以免显得俗气。然而，文学恰恰应根植于现实，反映生活。一个人的文学，首先是他生活的写照，是他全部生活经验的呈现，是他的喜怒哀乐与感悟思考。我认为，一个人要从事文学创作，首先应笃定生活，肯定生活。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否定或批判，而是说这些否定与批判应建立在自信与肯定的基础上，从而具有建设性，而非虚无或矫揉造作。此外，能否将自己的生活、工作文学化，也是一项考验。生活与工作各有差异，有些领域自带诗意，易于文学化，而有些可能较难，这考验一个人能否驾驭这一题材。因此，我格外看重这本集中篇幅不多的税务题材写作，它们让我看到了曹文军的为人。

古人云：“文如其人。”读曹文军的文字，我仿佛能见到他本人。他是一个踏实、勤奋、不计得失的人，对税务行业有着深刻的理解。从校校毕业后，他便投身税务岗位，一干就是几十年。从乡镇到市里，从人工上门收税到如今的电算化，他热爱这份工作，并通过它接触社会，接触各行各业的服务对象，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沧桑巨变。

对于曹文军而言，税务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这是他认识社会、读懂中国、体验世相人生的窗口。因此，他笔下的税务并不枯燥，而是充满了人物、故事、历史与情感。他全身心投入其中，不必刻意追求文学性，也不必担心我们这些税务工作的外行是否看得懂。因为他已将税务工作融入自己的生命，活得通透，所以他的文字也自然通透，流畅无阻。

这看似是曹文军的职业使然，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点位、一个视角。由此推及，我们不难理解他的文集中大量的日常生活叙事。税务工作只是曹文军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对待职业与工作的态度，同样体现在他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上。在描写日常生活时，曹文军敞开了自己的心扉，让我们看到真实的他与他的真实生

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文学始终以在场的方式描绘出不一样的风景。作家以文学为“取景器”，真正沉入生活深处，扎根新时期的山乡大地，推出了一批有时代温度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以“广角”或“聚焦”的方式，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精神和奋斗精神的新人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深刻反映了中国乡村走向全面振兴的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

报告文学作为记录时代的文体，真实性是其基本特征和命脉所在。苏有郎的报告文学《最后一站》以乡村振兴为题材，是一部真实感人、曲折动人、细节暖人且具有鲜明特色的作品。真实感体现在作者所做的大量深入采访和田野调查，确保了每一个事例、每一个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在创作中，要想“探寻真相之庐，穷究真知之衢”，作家需要扑下身子、迈开脚步，走向乡村、深入调研，才可“捧得圭臬出深山”，在这方面，苏有郎明显下了不少苦功夫。

《最后一站》的曲折动人体现在情节设计上的一波三折，其中既有主人公曲宪忠担心果园是“短期政绩工程”而持有不太信任的心理，也有村民、果农对曲宪忠所描绘的果园美好蓝图持有的怀疑心理，还有曲宪忠爱人张玉芬对丈夫持有的既支持又反对的矛盾心理。不同人物不同心理的交融交织交锋，使得故事情节更为生动。

拓展曹禺研究的一手史料

——评《我们的爸爸曹禺和妈妈郑秀》

□杨一丹

《我们的爸爸曹禺和妈妈郑秀》是曹禺的大女儿万黛和二女儿万昭合写的一部回忆性传记，书中不仅记录了女儿们对父亲曹禺和母亲郑秀饱含情感的细节回忆和内心阐释，也收录了郑秀未及完稿的、记述她与曹禺相识相恋，以及见证《雷雨》诞生全过程的回忆录遗作《烟云录》，还有曹禺、郑秀与万黛、万昭姐妹二人的往来信件近百封和大量照片。其中很多珍贵史料都是首次披露，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珍贵的史料价值，为今后的曹禺研究提供了新的一手史料和独特视角。

这部作品具有丰富生动的细节呈现和史料补充，以及剖析作家之殇的坦诚和勇气。万黛和万昭作为曹禺的女儿，不仅从亲历者的第一视角出发，回忆了与父母相处的点点滴滴，同时还结合知名曹禺研究者田本相、崔国良、曹树钧等的研究资料，忆述互证，呈现出更加细节饱满、鲜活生动的曹禺一生，尤其是曹禺与郑秀的第一段婚姻的始末细节以及曹禺在政治运动中的遭遇与心境，都在这本书中有着丰富的细节呈现和坦率剖析。

书中不仅展现了戏剧大师曹禺的魅力与才华，也以身边人的视角思考和探讨了曹禺后半生的创作困境。未能写出令自己满意的好作品，无疑是曹禺先生后半生最大的伤痛，作为亲人的万昭与万黛，触及这个话题需要巨大勇气。两位作者不仅通过回忆和书信翔实地记录了晚年萦绕曹禺身心的创作苦闷和噩噩，也对这一作家之殇进行了客观而全面的剖析，表现出作者们对于戏剧创作规律的深刻见解，这也是留给后人珍贵的镜鉴。

这部作品走进《雷雨》灵感“缪斯”郑秀的内心世界，丰富了曹禺剧作研究的情感向度。该书最可贵之处是用几乎相同的篇幅，以时间为轴将曹禺和郑秀的生活进行了对照铺陈，还收录郑秀在生命最后一年撰写的回忆录《烟云录》。郑秀这个名字对所有熟悉曹禺的人而言一定不陌生，但将郑秀如此性格鲜活、细节丰满地呈现于读者面前还是第一次。该书对郑秀的家庭历史、教育经历、婚恋细节、离婚后和晚年生活都进行了详细记述，对于理解这位对曹禺如此重要的女性、理

解曹禺这段充满人性真实的生活，丰富曹禺其人其作的研究向度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郑秀和曹禺婚恋和共同生活的时期，正是曹禺戏剧创作的巅峰期，他的代表作《雷雨》《日出》《原野》以及《蜕变》相继发表，尤其是《雷雨》的创作，几乎就是在郑秀的朝夕陪伴中一字一句诞生的。1933年暑假，曹禺恳求郑秀不要返回南京家里，陪他在清华园写作《雷雨》，他对郑秀说：“身边没有你，我将一事无成。”郑秀不仅给予曹禺温情的陪伴，还时时与他探讨剧情、构思人物，畅谈对社会的深层理解。热恋中的曹禺怀着周冲般的赤诚和纯真投入创作，因此将郑秀称为《雷雨》的灵感“缪斯”并不为过。话剧史论大家田本相先生认为曹禺和郑秀的婚恋经历“对研究曹禺的创作是十分重要的”，郑秀在“曹禺三部曲”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不懂得曹禺的婚恋，就很难深入曹禺的戏剧世界”。

历史上无数伟大作品的诞生，都与炽热的爱的灵光相关。两人恋爱之初受到郑秀父亲的反对，但“父亲的反对和压迫丝毫不能改变我和曹禺的意志”。在郑秀的回忆中，萦绕这个炽热的、最“雷雨”的人物正是在曹禺对郑秀一次次爱的倾诉中诞生的，甚至投射了曹禺自身炽热的情感和复杂的性格。“你们不知道他是多么会写情书，谁看到这样的信能不心动呢？”郑秀珍藏着他们婚前婚后的百余封信件，这些信件超越了一股意义上的情书，用郑秀的话说，那是荡漾在人类心中一切崇高美好的感情，饱含了对自由、光明的憧憬和对社会的深刻认识。正因为对这段炽热纯粹感情的眷恋，郑秀终生都在关注和默默扶助曹禺。

关于郑秀与曹禺的婚变，书中不仅以曹、郑二人的书信和朋友、亲人的回忆真实还原了全过程，更从女儿的视角冷静地思考了婚变的原因以及对曹禺创作的影响，从而深刻揭示了人性和情感的复杂性。事实上，万黛、万昭姐妹二人从1946年起就几乎由郑秀一人勉力抚育，曹禺没有再与她们生活在一起，当她们回忆起与父亲的分离以及分析父母分开的原因时，还是对父亲给予了深情的理解和温柔的释怀。她们和母亲郑秀一样，无比珍爱和相信父亲的艺术才华，并把父亲的艺术

以诗赋形式为历史人物立传

——评于中华的古体诗集《数风流人物：诗说历史名人》

□黄献国



《数风流人物：诗说历史名人》，于中华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4年8月

《数风流人物：诗说历史名人》上下两部671页，共40余万字。作者细数从西汉到清末600多位中国古代政治、军事、科学、文学、艺术领域的名人大家、帝王君主、英雄豪杰、枭雄奸佞。以诗赋形式，为个人物立传，以审美眼光细数流年，以诗、文形式品评历史功过。时而尘埃骤起，金戈铁马；时而人木三分，鞭辟入里；对人物而言，是高度凝练化、个性化、诗词化的人物传记；对诗学而言，是审美历史天空、群星璀璨，与历史尘埃涤荡的艺术再现；对史学而言，又是当代诗人从历史深处考古发掘、引领一代又一代叱咤风云、改变历史走向的英雄豪杰。

这部诗词集是于中华先生集半个多世纪读史、从教、从政、从文的结果。在这部著作的写作过程中，他查阅浩瀚史料，随手养成极好习惯，做了无数读书读史读经典的笔记。也正是源于这些宝贵的笔记，在他赋闲回家，每日陶冶于唐诗宋词典籍、醉心于诗词格律之美时，一辈子的经历陶然于胸，一辈子的读书读史读经典的积累使得灵感勃发，喷涌而出。

审美观照历史人物，让诗意的情怀在历史长河里奔涌。于中华先生的诗词，有着一大丈夫笑谈典故人

物的俏拙嘲讽之美，又有诗人心灵漫步古今，历数忠良英才罹难的悲壮之美。审美是诗的鉴赏中第一位的品评要素，写人物的古代诗词门槛较高。于中华先生的诗词人物，寥寥数笔，便活灵活现。他的《七律·刘濠》将刘濠一生的成与败、功与过交代得清清楚楚，从少年英雄、雄霸一方到坐断东南、兵败被杀结局，着实令人唏嘘不已；又如《中吕·山坡羊·曹冲称象》写道：“象船配套，水平记号。石头换物将包掉。静悄悄，有新招。相同重量标据报，多重几斤应亦晓。聪，少尚少；明，心太巧。”诗文语句精妙，稚拙俏丽，显童心童趣之美。

引古唱大风，风流壮诗文。司马迁的《史记》不仅在史学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文学价值也被广泛认可，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中国古代史家的理想和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数风流人物》所写的六百余人，也无不寄托着作者体恤社会民情、感悟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广阔视野。作者笔下的人物具有深邃的历史深度，和更具现实意义的文学价值。《临江仙·霍去病》诗云：“骁勇如神豪纵，单枪亦可从容。轻骑八百去如风，两千真虏首，尽数入囊中。笑那匈奴藏匿，便疆展我刀锋。边陲擒寇立丰功，威仪震陇右，此处论英雄。”年仅18岁便披挂上阵的青年将领、西汉名将、军事家霍去病，此诗表现他率八百精兵强将深入匈奴敌后，取得惊人战绩，继而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开拓河西走廊，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再如《念奴娇·李世民》，对大唐开国皇帝的历史功绩由衷赞赏。“太宗英武，见昌明盛世”“广纳雄才梁碧”“治国忧民，安邦理政”“励精图治，盖前朝用命历”，昌明盛世是政治家的理想，亦是黎民百姓的渴望。广纳雄才，治国忧民，安邦理政，励精图治，是改变隋末历史，“盖前朝用命历”，开拓大唐盛世的伟大先驱。他“薄赋劝农桑”，广纳谏言“广纳人才客”。作者对于李世民的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励志、薄赋尚俭，寄予深沉的讴歌赞赏。

文化名流尽收笔底，千古文心忧国忧民。中国古代文人的家国情怀，是一种深沉的文化情感和历史担当。这种家国情怀不仅是一种情感诉求和心灵皈依，更是一种生命自觉和文化承续。《数风流人物》写文人高尚情怀的占据多数，十分深沉而又精彩。例如，写杜甫的《清平乐·杜甫》云：“少陵谪笔，写尽人间疾。乱世身悲忧社稷，诗圣名扬宏德。心系黎庶怀公，史章喋血胸中。千载草堂清气，至今四海尊崇。”杜甫的诗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充满忧国忧民情感，如《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都表现了他的悲壮人生与深刻情感。“乱世身悲忧社稷”写出了作者对于拯救乱世百姓的忧患与政治抱负，“千载草堂清气，至今四海尊崇”则是写作者对于国家未来千载草堂清气的政治期许。再如《念奴娇·李商隐》诗云：“赋词格律，乐府民歌，精深奇绝。瑰丽唐诗标峻极，至此谁能超越？日月生辉，群星璀璨，诗圣当其列。可怜誉毁，痛疼难与人说。”作者先说李商隐才华过人，乃唐诗群星璀璨，当属其中最明亮的一颗，然“可怜誉毁，痛疼难与人说”，这样的奇才却“卑贱报国无门，逸才旷世，篱下寻生活。身陷党争蒙屈辱，历尽万般摧折。愤嫉苍天，放情遐想，肝胆如冰雪。朦胧清妙，声声皆是啼血”。李商隐的诗思缜密，多以含蓄象征的笔法、精工富丽的辞采、婉转和谐的韵调，曲折细腻地表现深厚的情感。他胸怀“欲回天地，力促唐王朝中兴的志向，但身处晚唐唐季，受尽屈辱，流落各地，已无实现抱负的可能。作者打通古今文人崇高精神风骨与肝胆相照的赤诚血脉，书写了震撼心灵的民族精神与文人高贵气节。

《数风流人物》承载五千年文明长河孕育出的独特精神内核，既展现了一种坚定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又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历史传承、责任担当。正是这种精神内核，让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屹立不倒，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支柱。

（作者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教授）

报告文学的“取景”与人文关怀

——读苏有郎的《最后一站》有感

□佟鑫

能力。在《最后一站》中，作者以一位老科技工作者深入乡村振兴现场为视角，围绕老科技工作者积极改变乡村面貌、带领农民致富而展开叙事，彰显了题材的独特性。

人文关怀的体现，是《最后一站》的另一特色。苏有郎不仅关注了乡村振兴的宏观进程，更深入到个体命运的微观层面，通过曲宪忠与村民们的互动，揭示了科技与传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与融合。这种人文关怀让读者在感受故事的同时，也能够对乡村振兴背后的人性光辉和道德价值进行深思。

《最后一站》还有一个特点是角度切得很准。主人公曲宪忠曾任省农林厅副厅长，此前还担任过基层乡镇的负责人，他身上的故事一定不少，如果展开，应该可以写成一部部长篇报告文学，但作者仅选取了曲宪忠68岁以后的时光作为叙事主线，选择了一个比较新颖的看似微弱的角度切入，把很多与主

题无关的背景隐去或一带而过，充分显示了作者对报告文学叙事角度的精准把握，同时也彰显了作者筛选线索、信源、素材的能力，正因如此，强调了“最后一站”的可贵性，让人从中品读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诗意。

难能可贵的是，苏有郎在书写曲宪忠的事迹时，以张群欧、张庆慈、张义德等一批村民或村干部的现身说法为叙事主线，通过他们的讲述来渐次展现曲宪忠的生动事迹和高风亮节，作者将自己置于更为客观的立场，以第三者的视角、口吻来推动故事情节的纵深发展，也使得作品有了极为鲜明的客观性特征，所述事例更显得真实、有说服力。另外，苏有郎在叙述中巧妙运用了非线性叙事手法，通过闪回和前瞻，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在一起，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立体的时间结构。这种叙事结构不仅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也使作品的主题更加深刻。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长期以来一直在探索如何在真实性与文学性之间找准那个微妙的平衡点。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报告文学不仅需要准确地反映现实，还要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故事，让读者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享受到文学带来的审美愉悦。苏有郎在《最后一站》中做出了很好的尝试，展现了作者的写作功底和对乡村振兴事业的深刻理解，为同类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作者系《中国作家》纪实版编辑部主任、副编审）